

一头银发、步履轻捷，12月17日，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坛迎来一位年近70岁的女士。她是潘美娣，是享誉中国古籍修复界的女性，1963年进入上海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与装帧工作，先后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为古籍修复专家。对于自己的工作，潘美娣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做了一件事，这是我的饭碗，尽量做好。”

锅里蒸“黑砖”，面团粘霉斑

古籍修复，很多人对这个行业有些印象，比如古典书卷气、绣花般的沉静细致。潘美娣告诉我们这些都对，但不是全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潘美娣曾接手过江苏太仓一个明墓出土的一套线装书。送到上海市图书馆的时候，这套书被包裹在一个塑料袋里，袋子一拆开，一屋子人都跑出去了。“不像书，就像一坨牛粪，臭烘烘的。”潘美娣现在还清晰地记着当时那本书“可怕”的样子：书上有各种颜色鲜艳的霉菌，红的鲜红，黄的亮黄，黑的长着长毛。在随后的修复中，潘美娣拿面团把这些霉斑一点点、一遍遍粘掉。这是古籍修复师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土办法，因为如果用刷子扫除，霉菌容易飞起，一旦落在好的书页上将会迅速繁殖。

潘美娣还发现，有的书页看起来比较厚，其实是好几层黏在了一起。于是她想了个土办法，在厚书页的两面用糨糊贴上两层纸，通过这两层纸的拉力将中间的书页一层层揭开，再清洗掉糨糊。潘美娣说，用这个方法，任何一张报纸她都可以一揭为二。

让潘美娣印象深刻的还有1972年修的一套明代成化年间的说唱本。这套书也很可怕，由于是陪葬品，放在墓主人身边，书被尸体腐烂后的血水浸泡成了硬邦邦的“黑砖”。潘美娣和同事想了个办法，把书放到蒸锅里蒸，书一软化就赶紧揭。先一沓沓揭，再一页一页揭。

书要趁热揭，稍微一凉就没法揭了，因为书页一凉就硬，而且比蒸之前还硬。潘美娣和同事就分沓蒸，一蒸透就抢着揭，一沓揭完再揭另一沓。就这样，两个人用了一个月时间一点一点把一套

【匠人匠心】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古籍修复师潘美娣：一辈子专心当『书医』

看起来无药可救的黑色书砖修整成了正常的书。

而古书被一页页揭开，当年的文字重见天日，研究人员才第一次看到了其中记录的明代风土人情、官例、民风。潘美娣说，这也是她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华被重新发掘出来，独一无二的东西被第一次发现。

上班第一天先练搓纸钉

古籍修复看起来似乎只是简单繁琐的手艺活。但干了五十多年古籍修复的潘美娣知道，这活虽然简单，做好却不容易，需要耐心、细心，还需要对书的爱心。

简单之中实则有千秋，一件简单的事，有心人才能干出水平来。潘美娣举了个例子，那是自己入行跟着师傅学的第一个活——搓纸钉。搓纸钉是修复人员的基本功，他们需要把皮纸搓成细细一条纸钉用于固定古籍书页。

1963年，潘美娣进上海图书馆的第一天被领到师傅跟前，师傅搓了一根纸钉给潘美娣看，然后就让她自己搓。师傅搓的纸钉又直又挺，就跟个钉子似的，她搓的纸钉却像麻花。她去问师傅，师傅就再搓一根给她看。“不跟你讲什么理论，也不给你什么指导，就凭你自己领会。”慢慢地，潘美娣搓的纸钉像了样子。再后来，



潘美娣搓的纸钉不但也又直又挺，中间还是空心的。空心就有弹性，穿过书页时可以拉长，穿好之后又可以回弹。这让纸钉有了更好的固定性能。

跟搓纸钉一样，修复工作中有许许多多细节看起来简单，实则很有技术含量。潘美娣说，古籍修复有个原则，修旧如旧。而如果没有耐心，缺乏对书的感情，这个工作中的繁琐细致就能让你烦不胜烦。你或许也能凑合完成一项修复，但是，一本古书可能被修成了一本现代的书，一些破碎零落的只言片语也可能就被轻易舍弃了。潘美娣记得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说过“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古籍修复技艺都靠师傅带出来

古籍修复这项工作如此繁琐复杂，对于这项工作的感情如何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潘美娣说她的想法很简单：既然领导给了你这份工作，你就得干。进馆没多久，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潘美娣又想，领导既然这么重视培养自己，那更得做好。

潘美娣一直念念不忘老

馆长顾廷龙。顾廷龙一直从事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方面的研究，还是书法家。顾廷龙认为练毛笔字对年轻同事修身养性、做好工作有好处，就自己写下《国际歌》让他们临摹。“馆长那么认真地、耐心地在启发我们，教我们入那么一个行。”自然而然地，潘美娣也慢慢地对工作付出心血，集中精力去做。

除了技艺，老先生们对书籍的态度也让潘美娣铭记一生。当年顾廷龙、潘景桢这些老先生可谓视书如命，他们拿书都是两手捧的，书口都是朝里面。如果方法不对，老先生马上就不高兴。

潘美娣说，传统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都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就像做纸钉，师傅给徒弟演示一遍，徒弟自己来做。做不好，师傅会再给演示一遍，不多说话，全凭徒弟在实践中摸索领悟，如果再做不好，可能师傅看你的眼神就变了。以前切书页要用马蹄刀，磨刀也是修复师需要掌握的基本功。师傅给示范一下，交给徒弟，就转身去了隔壁房间。徒弟磨着磨着，隔壁传来师傅一句话“没吃饭啊”，意思是力气用小了。师傅不会手把手地教，但他会从徒弟磨刀的声音判断出了什么问题。后来，这种古老的传承方式渐渐丢失。

据十年前的一次统计，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不到100人，修好一套霉蚀严重的古书可能需要一两年。但是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一半以上亟待修补、保护。浩渺的古籍数量和紧缺的古籍修复人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好在2007年开始，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设立了12个古籍保护分中心，包括古籍修复的培训班办了大概19期。由此，潘美娣等老一辈古籍修复专家成为各大高校、图书馆争抢的对象。年近七十的潘美娣大部分时间在各地飞来飞去。虽然忙碌，但她很开心。因为，让古籍修复这门手艺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的子孙才知道祖先有多少宝贝。

【民间忆旧】

追忆故乡工匠铺

□卞文志

时隔40多年，今日忆起故乡青石板小街两侧的那些工匠铺，以及那些铺子里传出来的“叮叮当当”的响声，仿佛仍然萦绕耳畔。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那条古老的小街两侧，林立着十几家木匠铺、铁匠铺、酿造铺、烧饼铺……铺子里的乡村匠人，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是某一项传统手工艺的老手。

我们村是鲁南地区的大村庄，人多姓杂，荆家和卞家是大户。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是一个商贾云集的繁华小镇，聚集了众多工匠。记得当时的小街上，最有名的是三家老荆家的铁匠铺、两家卞姓的木匠铺、一家王姓的白铁铺和三家刘姓的烧饼铺。

老荆家铁匠铺子所打造的犁铧、锄头、镰刀远近闻名，由于质优价廉，产品远销到鲁南地区的枣庄、苍山、滕州等十几个县市的农村。那时我们村有逢三排八的大集，几十里外的百姓都来赶集购买或销售农具和农产品，有些百里路外的农民为了能买到老荆家打造的农具，都是头一天步行赶来住在骡马店里，第二天赶完早集，购买得满满当当，再挑着担子颤颤悠悠地赶回去。老荆家的铁匠铺子打造的农具销路好，铺子便没有打烊的时候，白天黑夜，铺子裡的炉火总是旺旺的，铁锤敲打铁鏊的“叮当”声彻夜不停，在古老的乡村，炉火映照下，铁与铁打击出来的交响曲十分动听。

40多年前，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冬天冷了，我便约上几个小伙伴去铁匠铺里取暖，但我们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红彤彤的炉火，看着铁匠师傅将烧红的钢铁从炉火中取出来，两个人一个大锤，一个小锤，在铁鏊上一阵敲打，一块红红的铁，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张锄头或一柄镰刀。

我的本家大爷和他儿子是名扬十里八乡的木匠，爷俩儿的木工活算得上是当地一绝。记得他家的木匠铺子就开在小街南端的西侧，一个大大的庭院，摆满了他们雕龙绣凤的木制家具。大爷的手艺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哪怕是弯脖子柳，疙疙瘩瘩的槐，经过他的巧手，都能打造出漂亮耐用的家具。记得那时，我对本家大爷的木工手艺十分好奇，常常跑去观赏，看他哼着民谣拉大锯的神态，看他手拿墨斗斜着眼睛在木料上放线的宁静，有时候听见他将大块木头往支架上放的那一声吼，简直如同在东北大森林里伐木。

在那个年代，我们村及周围村里的木工活儿，基本上被他们爷俩儿承包了。记得那时，谁家闺女要出嫁了，备好了木材，就请他们去做，嫁妆需要做上一两个月。那确实是慢活，他们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准时到达。东家往往在家里留一个人相陪，奉上烟、茶，偶尔也会有邻居过来闲聊。墨盒、刨子、斧头、锯，就用这些工具慢慢打磨，不用一颗钉子，就能做出各式衣柜和桌子。

据老一辈人讲，农村这种传统的木匠活儿，不知从什么时候就有了，也许是从上千年前流传下来的。上世纪90年代，农村出现了电锯、电刨子，虽然声音刺耳，却又省力又快捷。大爷去世后，他的儿子虽然继续当木匠，可最终还是被镇上的家具厂打败了。渐渐地，他们的名字也就没人记得了。

作为本家大爷的后辈，我至今为他们家祖传的木匠手艺失传而念念不忘，同时也为乡村各类工匠的消失感叹不已。而今，铁匠、木匠、白铁匠、豆腐匠等乡村传统手艺人 在农村都找不到了，时代的发展使丰富多彩的生活用品和工业产品取代了那些传统的手艺，但这些工匠和他们的手艺，依然会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在怀旧和乡愁泛起时，那些乡村工匠的音容笑貌、打造手工制品的声音，就像一幕幕电影一样在我们眼前闪现。

【老照片】

一大家子

□王晶

这是一张三十多年前在外婆家拍的全家福。这张照片虽然不是我保存的最老的照片，却是我自己最“年轻”的照片（一排左五），也是在一起拍照人数最多的一张照片——有32个人。那时候老妈才二十多岁，老爸刚从东北部队退伍回来。

外婆外公（二排左二左三）那时候辛苦养活这么一大家子着实不容易。从十几岁他们结婚，两人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一直不离不弃，老妈说他们老两口一辈子都没吵过架。听外婆讲，外公当年大专毕业分配工作，可以选择当教师也可以选择进厂，由于那个年代进厂比较流行，于是外公选择了去县里一家国营机械厂当会计。我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跟着外公去厂里玩，他住在厂里宿舍二楼，干活的车间和办公室在一楼。我当时虽小，但至今记得车间里整天机器轰鸣的场景。

照片后排是我八个舅舅和两个姨父，拍这张照片时，好几个舅舅才十几岁。最前面一排是一大家子里的女同志——舅妈和姨，她们当年一起去公社里挣工分。中间那排还有几位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亲戚，对比一看，感觉“大城市”来的真有那么一点点“洋气”。第一排我们六个孩子中我是年纪第二大，小时候在一起玩没少掐架。

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闯荡”，所以全家福上的年轻人好多都在闯荡中去了外地安家，这样全的全家福很难再拍到了。想当年一大家子晚上点上着煤油灯，一起剥棉花聊天的场景也成了那个年代的记忆。只可惜，照片的底边由于16年前老家闹洪水转移时，不小心沾上了水被裁剪了，如今和其他老照片一样，被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